

农地流转、 区域差异与效率协调

□夏玉莲 □匡远配 □曾福生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本文运用DEA模型、malmquist指数以及HR协调度模型分析了农地流转对于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效率情况,并基于效率协调原则提出了农地制度发展的方向及需注意的问题,给农地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点。研究结论表明:目前我国农地流转对“三农”发展的效率存在明显的不协调性和地区不平衡性,农业增产效率最大,农民增收效率次之,农村发展效率最差;东部发达地区的流转效率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但东部地区效率协调情况较差。未来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体现农地流转的效率多维性,从效率协调的视角给经济效率框定一个不能逾越的“条件极值”,建立政府监督农地流转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农地流转;区域差异;农地制度

中图分类号:F3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6)03—0087—09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16.03.015

引言

目前,农地流转已呈常态化趋势。据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的数据,2014年,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为40339.467万亩,比上年提高了18.3%;经营耕地100—200亩以及200亩以上的农户数分别为74.8万户和31.1万户,比上年分别上升了12.9%和2.1%;未经营耕地的农户数为1577万户,比上年提高了11.5%。与土地流转并存的是耕地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以及人口、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土地流转是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需要,但更为重要的影响还在于其反映了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结构性变革现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契机。事实上,土地流转的效率问题同样引起了广泛地关注。

大部分学者认为农地流转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贺振华指出土地流转的效率应该来自流转后能够增加新的生产要素,而不应该是来自于把抛荒的土地耕种起来所增加的收入^[1]。华彦玲提出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几个衡量标准:是否被分配给利润最大化的使用方向?是否能够增加有赖于土地利用的生活水平?是否可以保持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2]?陈海磊等用亩均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用农户土地净转入作为因变量来衡量土地流转效率^[3]。李维认为土地流转直接提高生产技术效率,农地流转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产生交叉效应,间接提高生产技术效率^[4]。同时,还有部分学者提出土地流转的效率不应当单纯考虑土地生产力的提高,而应当更多地考虑是否增进农民整体福利、农村经济增长等其他效率^{[5][6][7][8]}。薛凤蕊提出土地流转后人均纯收入显著增加,土地流转后务工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绩效评价:基于双QE框架”(7127308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研究”(7157308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地流转的综合效益评价:基于双SE框架”(71473080)

和出租土地收入对参与农户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5%^[9]。黄雅敏从经济哲学的理论层面上指出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人口和劳动力变动、规模经营以及城市化等引起的土地流转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便是有效率的土地流转^[10]。武立永从个体效率、制度运行效率和制度经济效率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涉及到的四个效率:农村居民的效率、城镇居民的效率、政府的效率和社会效率,认为这四种效率并不完全一致^[11]。王慧青等分析了湖南省部分地市农村土地流转的社会效益和农村经济效益^[12]。朱前涛等总结了成都土地流转在农村产权制度、农村融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效率^[13]。除此之外,余小英等用反事实度量法分时期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效率,结果表明市场规范化时制度效率最优,土地流转不完全时制度效率次之,土地流转初步实施阶段制度效率最差^[14]。

本文将基于2011—2013年我国30省份的数据,从农业增产、农村发展以及农民增收三个层面分析农地流转的效率,并基于效率协调原则比较这三种效率的差异及其区域差异,最后结合文章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发展需注意的问题。

一、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在当前土地资源紧张,尤其是耕地资源有限性与人口增长之间矛盾凸显的情形下,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农地流转是土地利用制度的重要改革与创新,因而农地流转效率的衡量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本文中,农地流转效率主要指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效率。农地流转与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关系最为直接与密切,本文提出了一个体现农业、农村与农民“三农”发展水平的效率分析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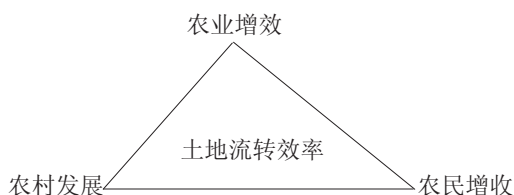


图1 农地流转效率的分析框架

一是农业增产效率。我国户均耕地经营面积不到半公顷,土地细碎化严重,由于规模小、产值低,农民利用新技术、新品种的积极性不高,有些地方的耕地还出现了季节性抛荒。保护稀缺的耕地资源,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保证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都需要合理有序的农地流转。因此,农业增产是衡量农地流转效率的重要方面。二是农村发展效率。农村土地除耕种形成农业

经营性收入以外,能形成的收入极低。农地流转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渠道,出租、转包、托管、信托等农地流转模式能形成一定的财产性收入。尤为重要的是,农地流转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顾之忧,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支出,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因此,农民增收是农地流转效率的核心体现。三是农民增收效率。农地流转促进了农村合作组织、农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涌现;在农地流转基础上出现的新型农地经营模式如农地信托、农地托管等,优化了地方投融资环境,也影响着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消费等,农地流转对农村发展的促进、改善与融合效应显现。因此,农村发展水平也应被纳入到农地流转效率的考量分析体系中。本文将在这个分析框架下讨论农地流转的效率及其协调水平,提出研究假说,然后通过实证分析检验这些假说。

1. 农地流转对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影响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农地流转对粮食产量、农业产值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对城镇化率、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等的影响多为间接的;且这些效率之间往往存在传导效应以及外部性,相互耦合、互相作用,如农地流转的要素重置效应也会协同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规模、农业机械化程度等进一步影响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发展。由此,本文提出假说1:农地流转的农业增产、农村发展以及农民增收效率之间发展不协调;农业增产效率最大,农民增收效率次

之,农村发展效率最差。

2. 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和人员,非农就业成为引致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随着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农民非农就业比重提高,非农收入增加,农民传统的珍惜土地的观念越来越淡化。随着建设用地的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相比于农业较低的比较收益,农民也不再愿意经营耕地。农地流转不仅能为工业化、城镇化囤地存人,非农产业的发展程度也是农地流转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此,本文提出假说2:农地流转效率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地流转的效率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效率存在差异。

3. 农地市场体制的完善程度影响农地流转的效率。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农户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较高的交易成本构成了农地流转效率的一大障碍因素。当存在一个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时,农地流转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农户向生产效率高的农户转移,但也可能使得土地配置更不平均^{[15][16]}。如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匮乏导致土地供求双方信息受阻,限制了农地流转的区域范围,影响农地流转的速度、规模和效率。由此,本文提出假说3:随着土地市场建设的不断完善,农地流转效率不断提高。

4. 我国农地流转制度属于一种诱致性制度^[17],农业生产水平提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经营者收入,促使农户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需求产生。农地要素的边际产量差异性为农地流转效率的宏观基础,农业生产技术是农地流转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而农地经营者的异质性是其微观原因,如家庭资本量、户主年龄与受教育程度等都与土地租赁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18][19]}。由此,本文提出假说4:由于农村土地资源条件、劳动力资源禀赋以及农业技术创新与运用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农地流转存在投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二、检验方法、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检验方法介绍

1. 农地流转的效率分析模型

(1)规模报酬可变下的VRS模型

由于土地、劳动以及资本投入的差异性,农地流转往往难以达到最佳规模经营,采用CRS模型的技术效率就不准确,因为技术效率中存在规模效率。因此,本文采用Banker Charnes和Cooper(1984)提出的可变规模报酬的DEA模型VRS(variable return to scale),以 θ 表示效率值,VRS的线性规划模型为(1)式。

$$\begin{cases} \min[\theta - \varepsilon(e_1^T IS + e_2^T OS)] \\ \sum_{j=1}^k X_j \lambda_j + IS = \theta X_{j_0} \\ \sum_{j=1}^k Y_j \lambda_j - OS = Y_{j_0} \\ \sum_{j=1}^k \lambda_j = 1 \\ \lambda_j \geq 0, (j = 1, 2, \dots, N) \\ IS \geq 0; OS \geq 0 \end{cases} \quad (1)$$

若 $\theta < 1$,则说明决策单元DMU(某省)不为DEA有效,说明该决策单元(某省)投入组合不当,可以做全面的等比压缩;若 $\theta = 1$,且 $e_1^T IS + e_2^T OS > 0$,则DMU仅为弱DEA有效,反映这N个决策单元组成的系统中,有部分超量或亏损产出;若 $\theta = 1$,且 $e_1^T IS + e_2^T OS = 0$,则DMU为DEA有效,表明该决策单元技术效率最佳。

(2)malmquist 指数

对于农地流转效率变化的测定,本文选择malmquist指数法,不需对生产函数结构做先验假定、不需对参数进行估计、允许无效率行为存在,且将效率变动分解为技术进步(techch)和技术效率变化(effch),技术效率变化在可变规模报酬(VRS)下又可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动(pech)和规模报酬变动(sech),因此,全要素的变化率 TFP_{ch} 可以表示为:

$$TFP_{ch} = effch \times techch = sech \times pech \times techch$$

若 $TFP_{ch} > 1$,则表明农地流转的生产效率增长,反之则下降。Techch代表技术进步,是指农业生产技术以及经营模式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而形成的农地流转效率的提高,反映农地流转后对新技术、新经验的模仿,若大于1,表示技术进步,反之则为技术退步。Effch代表技术效率变化,是指在给定的投入要素组合不变的情况下,一个被测算对象的实际产出与假设同样投入下的最大产出之比,若大于1,代表技术效率改进,反之则技术效率降低。Sech表示规模效率变化,反映被测算对象是否在最佳的投入规模下进行经营,若大于1,代表规模优化,反之则为规模恶化。Pech表示纯技术效率变化,反映被测算对象技术运用水平变化所产生的效果,如大于1,代表技术运用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下降。

2、农地流转的效率协调度模型

对于农地流转的效率协调度测算,本文沿用了曾福生等在衡量中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三化”协调发展中使用的方法^[20],依据效率值的标准差和均值,建立HR模型,并进一步求得农地流转效率的协调度。

$$HR_{it} = 1 - \frac{\sqrt{[(\rho_1 - \bar{\rho})^2 + (\rho_2 - \bar{\rho})^2 + (\rho_3 - \bar{\rho})^2] / 3}}{\bar{\rho}} \quad (2)$$

其中, $\rho \in [0, 1]$, ρ 为效率值,当 $\rho = 1$ 时,说明农地流转后不存在投入的冗余和产出的不足,投入产出落在最佳的生产前沿面上,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佳。当 $\rho < 1$ 时,表明农地流转后的效率没有达到最优,还有可以调整改进的空间, $\bar{\rho}$ 为效率值的均值。 $HR_{it} \in [0, 1]$,HR为协调度,HR越大表示协调度越好,反之则表示协调度越差。本文将中国各省份按协调发展水平分为4类,记为 $CORD_{it}$,具体划分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农地流转效率协调类型

$CORD_{it}$	协调类型	划分标准
1	协调且高效	$HR_{it} \geq 0.5; 0.9 \leq \rho \leq 1$
2	协调且有效	$HR_{it} \geq 0.5; 0.7 \leq \rho < 0.9$
3	协调且无效	$HR_{it} \geq 0.5; \rho < 0.7$
4	不协调	$HR_{it} < 0.5; 0 \leq \rho \leq 1$

(二)指数选取和数据来源

根据DEA模型的特点,在选取投入产出指标时,尽量兼顾数据的科学性、可获得性,同时参考相关文献的评价指标。本文结合“三农”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目标,从这三个方面选取产出指标:一是选取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粮食产量(万吨)作为农业增产的评价指标;二是选取恩格尔系数(%)、城镇化率(%)作为农村发展的评价指标;三是选取城乡收入比(%)、工

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占比(%)作为农民增收的评价指标。投入指标选择农业技术投入、农业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生产资料投入,分别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亩)、农村人口数(万人)、农用作肥(万吨)四个指标来表征。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农地流转的效率分析

1. 基于DEA模型的农地流转效率变化

使用考虑规模收益的VRS模型分析中国2011—2013年30省份的农地流转效率,结果见表2。图2为中国2011—2013年农地流转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综合效率情况,横轴省份排列分别为东部11省份、中部8省份和西部11省份^①。将综合效率值进行比对^②,农业增产效率三年的均值分别为:0.774、0.771、0.759,农民增收效率三年的均值分别为:0.306、0.310、0.310,农村发展效率三年的均值分别为:0.283、0.283、0.281,农地流转的农业增产效率大于农村发展效率和农民增收效率,农村发展效率最小,正好验证了假说1。具体分析:

(1)对农业增产而言,吉林、黑龙江、海南、青海三年都达到了DEA有效,综合效率值为1。江西、四川在2011年达到DEA有效,但2012年、2013年出现了递减;内蒙古、辽宁则呈效率递增;山西、江苏、安徽、重庆、贵州、甘肃、新疆7省出现倒“U”型增长趋势,2012年效率最为明显;其他省份农业增产效率都是呈递减效应且非DEA有效,反映我国农地流转的农业增产效率不佳。(2)对农村发展而言,只有上海、海南三年都为DEA有效,青海在2011年、2012年为DEA有效,其他省份为非DEA有效,除北京、广东、四川、宁夏为效率递减,新疆、甘肃、云南、贵州、重庆、广西、湖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天津的效率不稳定,波动较大;其他省份为效率递增。(3)对农民增收而言,只有上海、海南、甘肃三年的DEA有效,其他省份都是非DEA有效,大部分省份效率递增,北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福建、广东、广西、重庆、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效率不稳定,四川、贵州、云南效率递减。(4)将中国分为中部、东部、西部三个地区比对。东部地区的农业增产效率最差,有6个省的效率值在0.6以下,西部地区效率最好,中西部和中南部省份间的波动最明显;对农村发展效率而言,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效率波动较大,中部地区各个省份的效率波动不大且效率最差,中部八省当中,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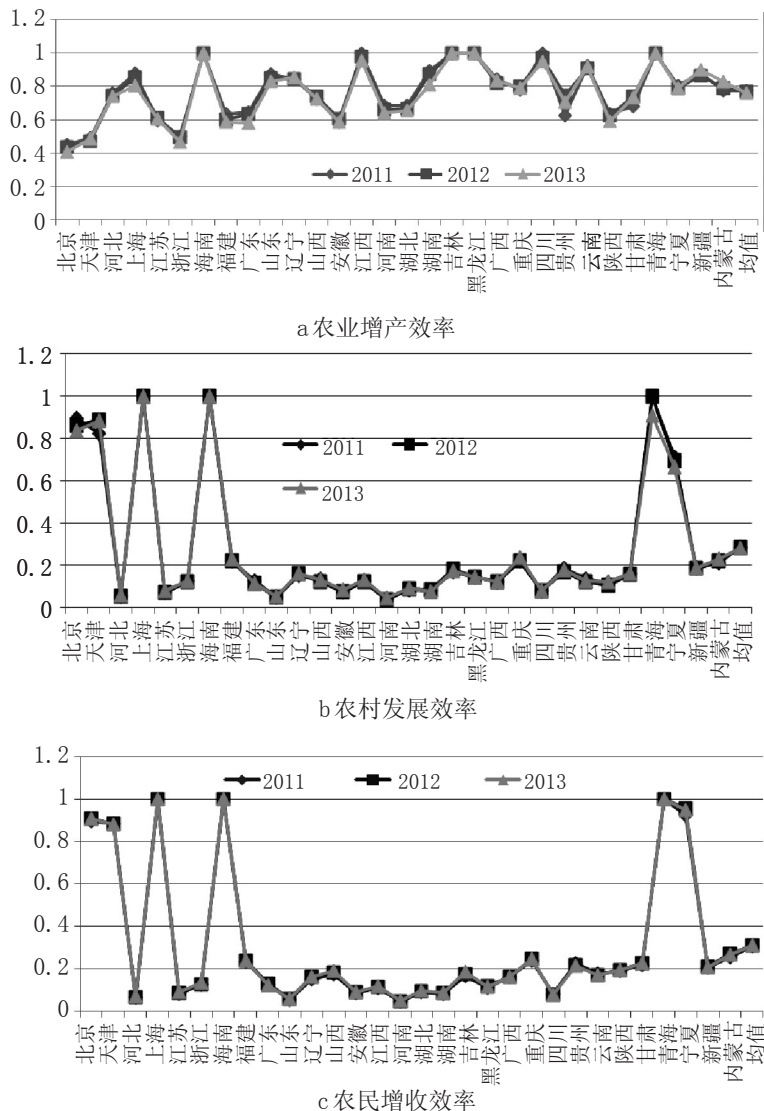


图2 2011—2013年农地流转的综合效率比较

①东部11省: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海南、福建、广东、山东、辽宁;中部8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西部11省: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

②由于篇幅,各年度各省的效率值不罗列,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有一个省份的农村发展效率值超过了0.2,与较高的农业增产效率严重不协调,农业增产效率高于农村发展,验证了假说2。除此之外,西部的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又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西南地区的波动不大且效率较低,接近中部省份的发展势态,而西北地区则波动较大,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农民增收的效率发展情况和农村发展大致相同,中部地区、西南地区效率平稳而差,东部地区、西北地区波动大。

2.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农地流转效率变化

表2为2011—2013年分年和分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的计算结果。从2年30省份农地流转效率的总体平均水平(TFP_{ch})来看,2011—2013年间,农民增收效率变化最明显,为0.964。分区域看,差异性较大,东部地区农地流转的农村发展效率最明显,为0.983;西部地区农业增产效率最明显,为0.937;中部地区则农民增收效益最明显,为1.027,只有中部的农民增收效益超过1,说明这三年当中农地流转的效率较低,也验证了本文假说1、2。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农地流转给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大的冲击;中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农地流转促进了大量劳动力的转移,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提高,农民增收效率最为明显;西部地区的农地流转改变土地经营的细碎化,规模化、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增产效率明显。

表2 农地流转的分年与分区域 TFP 指数

	年份	农村发展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effch	techch	pech	sech	tfpch	effch	techch	pech	sech	tfpch	effch	techch	pech	sech	tfpch
全国	2012	0.988	0.987	0.966	1.023	0.975	0.997	0.922	1.008	0.988	0.919	1.025	0.918	1.079	0.95	0.941
	2013	1.024	0.906	1.028	0.995	0.927	0.982	0.931	0.985	0.997	0.915	1.006	0.981	1.034	0.972	0.987
	mean	1.006	0.945	0.997	1.009	0.951	0.989	0.927	0.996	0.993	0.917	1.015	0.949	1.056	0.961	0.964
东部	2012	1	1.045	1.009	0.991	1.045	0.993	0.942	0.993	0.999	0.935	1.005	0.941	0.993	1.011	0.945
	2013	1.019	0.908	1.011	1.008	0.925	0.98	0.94	0.981	0.999	0.921	1.002	0.96	1.194	0.839	0.962
	mean	1.009	0.974	1.01	1	0.983	0.986	0.941	0.987	0.999	0.928	1.003	0.951	1.089	0.921	0.954
西部	2012	1.006	0.953	1.104	0.912	0.959	1.019	0.918	1.036	0.983	0.935	1.005	0.895	1.027	0.978	0.899
	2013	1.013	0.877	0.995	1.018	0.889	0.988	0.951	0.991	0.996	0.939	0.974	0.978	0.977	0.996	0.952
	mean	1.01	0.914	1.048	0.964	0.923	1.003	0.934	1.014	0.989	0.937	0.989	0.935	1.002	0.987	0.925
中部	2012	1.001	0.987	1.002	0.999	0.988	1.005	0.9	0.988	1.017	0.904	0.996	0.978	1.002	0.995	0.974
	2013	0.974	0.966	0.957	1.018	0.941	0.966	0.942	1.001	0.965	0.91	1.001	1.082	0.93	1.077	1.083
	mean	0.988	0.976	0.979	1.009	0.964	0.985	0.921	0.995	0.991	0.907	0.999	1.029	0.965	1.035	1.027

从技术效率变化(effch)的角度看,农民增收效率最明显,2012年、2013年都出现了增长,农村发展在2013年也出现了增长;其中,2012年的农民增收增长最快,达到了2.5%的增长率,2013年的农村发展也达到了2.4%的增长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效率变化最显著,东部的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分别有0.9%和0.3%的增长率,西部的农村发展和农业增效分别有1%和0.3%的增长率,中部地区最差。技术效率的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加的主要原因。对技术效率的进一步分解表明,纯技术效率(pech)在绝大部分区域和年份看都出现了上升,说明在我国各地区都加大了对农地流转的管理力度,农地流转市场不断完善,农地流转效率在提升,这正好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3。

农地流转的规模效率(sech)普遍较低,只有2012年的农村发展增长率是大于1的;分区域看,中部地区的规模效率相对较高,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均值都超过了1。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偏低,对技术效率的贡献不明显。从技术变化(techch)的角度看,只有中部地区的农民增收效率超过1,其他都在1以下,技术变化直接影响到TFP的增长情况。这反映农地流转效率的提高依靠技术的进步是一

种有效的方法,技术成为制约我国大部分地区农地流转效率的主导因素,验证了假说4。

表3 农地流转的分省TFP指数

	正增长
农村发展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安徽、河南
农业增效	内蒙古
农民增收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河南、湖北、重庆、甘肃、宁夏

10.4%;对农业增效而言,仅有内蒙古出现了正的增长率,为3.7%;对农民增收而言,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河南、湖北、重庆、甘肃、宁夏11省出现了正的增长率,吉林的增长率最快,为5.2%。因此,总体来看,东部发达地区农地流转的效率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效率,农地流转对“三农”发展的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这正好验证了本文的假说2。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技术变化的结果,技术效率的变化制约了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农地流转效率的提高。

(二)农地流转效率的协调度分析

在农地流转的农业增产效率、农村发展效率以及农民增收效率基础上,运用HR协调度模型测算出各省份农地流转的协调度。结合效率值和协调度,可以发现,农地流转的效率分布不均衡,中国农地流转在2011—2013年的农地流转效率可以分为4类(见表4)。

表4 农地流转效率的协调类型(2011—2013年三年的协调类型相同)

CORD _{it}	协调类型	代表省份
1	协调且高效	重庆
2	协调且有效	辽宁、吉林、新疆
3	协调且无效	黑龙江、福建、山西、江西、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内蒙古
4	不协调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海南、广东、山东、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青海、宁夏

效或失调。农地流转模式具有不同的区域适应性。进一步对30省份的农地流转效率协调值进行分析,仍然将30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进行比较(见图3),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得出:

从区域来看,第4类“不协调”类型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东部效率协调均值处于0.3792—0.399的区间,中部地区的效率均值也只在0.4461—0.4478的区间。东部地区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1)东部经济发达,农地流转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率高,农民增收效益明显,农村发展也相对较好;(2)对农业发展

从分省的TFP指数来看(见表3),这三年间,对农村发展而言,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安徽、河南出现了正的增长率,其他省份为衰退趋势,北京的增长率最快,为

从三年来我国30省份的CORD值来看,大部分省份的农地流转效率属于协调且无效以及不协调类型,反映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农地流转属于低效率、低产出水平,农地流转模式与地区经济条件不匹配,投入产出不合理。各地区应适当调整农地流转的模式,协调土地资源与当地经济、技术的条件,避免流转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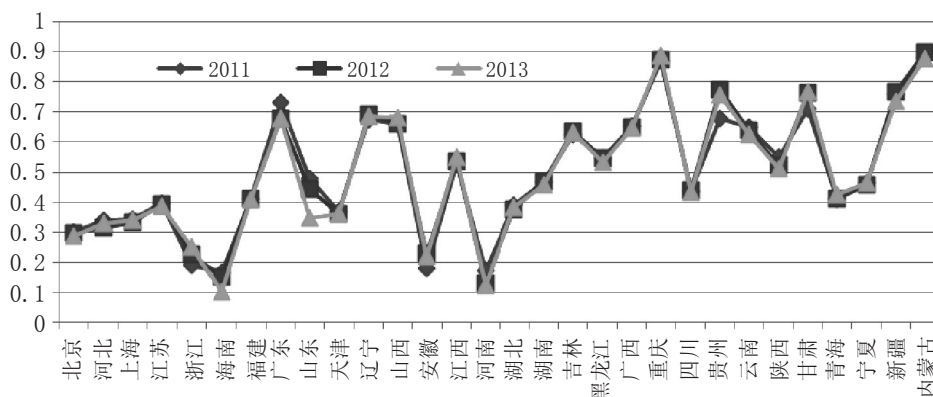


图3 2011—2013年农地流转的效率协调情况

而言,一方面农业人才流失严重,另一方面与经济发达区域临近的地区农业非农化现象普遍,农业增产效益较差。此外,东部地区省份之间的效率差异也较大,浙江的协调情况最差,福建的协调度最优,两者之间的差距在0.5以上,省份之间农地流转的条件、环境以及要求都有明显的差异。中部地区则由于经济发展较差,农地流转后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普遍,农村留守人员多为老人、小孩,农村建设较差,农业增产也不明显,与农民收入增加不协调。这验证了本文假说2。第3类协调且无效类型主要集中在西部,西部地区的效率发展水平大致相当,效率协调值都在0.4以上,内蒙古和重庆的效率协调值最高,接近0.9,但是西部地区属于无效的协调,西部的农业增产不明显、农村发展没有好转、农民增收不佳,是低产出、低水平的协调。西部地区要加快土地市场的建设,并探索和当地资源禀赋与经济相适应的农地流转模式。

从纵向看,从2011—2013年,全国30个省份中有14个省份农地效率的协调度在下降,效率协调改善的省份只有6个,东部11个省中有8个省的效率协调度在下降,改善的只有1个,反映农地流转背景中东部地区的“三农”发展不均衡性在逐渐扩大,土地管理的方向需要调整,要在保证高效的基础上注重协调;中西部地区效率协调的波动性大,且效率改善省份也较少,要在着重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保证协调。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三个方面分析了农地流转的效率问题,研究表明:(1)从农地流转的效率内涵上看,农地流转的农业增产效率、农村发展效率以及农民增收效率之间发展不协调。农业增产效率最大,农民增收效率其次,农村发展效率最差,农民增收的效率变化最大。(2)从农地流转效率的区域特征上看,东部发达地区农地流转的效率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但东部效率协调度较差,西部地区则是无效的协调。农地流转对“三农”发展的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3)从农地流转的效率发展看,随着对土地流转管理力度的加大,土地流转市场不断完善,农地流转的效率在提升;由于农业技术、土地资源条件、劳动力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农地流转存在投入结构不合理问题。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一些政策启示:

首先,农地流转是一个涉及到多主体、多要素、多目标的复杂体系,必须避免过度强调单方面的功能效果而造成的片面性。农村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等效率指征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但单方面的欠缺必将导致其他方面以及整体效率的下降。因此,土地制度建设应体现农村土地流转的功能复杂性、影响系统性以及效率多维性,科学权衡农地流转对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效果。应探索建立合理、科学的农地流转效率评价体系,构建“政府+第三方机构”的农地流转效率测评主体。

其次,从效率协调的视角,农地流转效率的衡量与测算,效率指征更多地表现为经济效率,但单项效率最大化与效率协调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基于效率最大化目标,应当给经济效率框定一个不可逾越的“条件极值”,在保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增收等经济效率的同时,平衡诸如城镇化率、乡村治理等社会效率指标,有效推进农地资源配置市场化、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化解效率最大化与效率协调性之间的矛盾。因此,要积极推行能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率和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农地流转新模式,如抵押流转、土地入股、托管、信托经营等,探索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最后,要让农地流转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应在考虑地区差异、资源环境差异、农业技术运用程度、劳动力禀赋水平等农业成本的基础上,分类指导农地流转,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土地流转原则、土地流转方式,动态监测与调整土地流转的效率与模式,从而完善政府监督农地流转的制

度体系。因此,不仅要基于农地流转效率的地区差异性,完善农村土地管理体系,形成规范、高效的农地交易市场,探索家庭承包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实现途径与农地经营模式;还应强化政府在土地利用、土地流转、耕地保护、土地储备及用途管制等方面的制度功能,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 [1] 贺振华. 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分析[J]. 改革, 2003, (4): 89-92.
- [2] 华彦玲. 苏南乡村土地流转的地权效率分析[J]. 经济问题, 2009, 44(1): 84-86.
- [3] 陈海磊, 史清华, 顾海英. 农户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吗?——以山西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 (7): 61-71.
- [4] 李 维. 农村土地流转与生产技术效率分析——基于江西水稻种植农户调查数据[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5, 14(4): 354-361.
- [5] 曹建华, 王红英. 农村土地流转的供求意愿及其流转效率的评价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07, 21(5): 54-60.
- [6] 张浩博, 陈池波. 集体土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效应的影响——基于A县的案例分析[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2(2): 166-169.
- [7] 贾庆英. 农村土地流转效率研究综述[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0, (6): 58-61.
- [8] 肖 飞, 张 光.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效率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55(5): 532-536.
- [9] 薛风蕊, 乔光华, 苏日娜. 土地流转对农民收益的效果评价——基于DID模型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1, (2): 36-42.
- [10] 黄雅敏. 土地流转的效率与公平[J]. 福建理论学习, 2003, (11): 31-32.
- [11] 武立永.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权制度的效率与正义问题研究[J]. 兰州学刊, 2014, (8): 191-197.
- [12] 王慧青, 尹少华. 基于DEA模型的湖南省农村土地流转经济效益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3, 34(186): 107-110.
- [13] 朱前涛, 金 莉, 陈世杰. 农村土地流转的公平与效率性分析[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12, (5): 1-7.
- [14] 余小英, 王章名, 王成璋.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效率分析[J]. 社会科学家, 2015, (6): 53-57.
- [15] 贺振华. 农户外出、土地流转与土地配置效率[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4).
- [16] 陈训波. 农村土地流转与资源配置效率[J]. 西部论坛, 2013, (3): 1-6.
- [17] 丰 雷, 蒋 妍, 叶剑平. 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制度演进及地区差异研究[J]. 经济研究, 2013, (6): 4-18.
- [18] KUNG, JAMES KAI-SING. Off-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2): 395-414.
- [19] YAO, YA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d Lease Market in Rural China[J]. Land Economics, 2000, 76(2): 252-266.
- [20] 曾福生, 高 鸣. 中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 (1): 24-39.

(收稿日期: 2015—12—17 责任编辑: 李俭国)